

日本社会研究的轨迹、特点及问题

——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综述

胡 澎

摘要: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取得了不小进步。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增长,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理论深度有所提高。当今的日本社会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高素质的研究队伍正在形成;及时抓住日本社会的新问题;运用比较视角进行研究;在中国翻译出版日本社会学著作。但客观而言,中国日本社会研究的总体水平依然比较滞后,学术成果零散而不够系统,许多研究还停留在描述性和阐述性阶段,研究方法也亟待改进,中日两国共同的合作研究较少。相信随着中国学者研究经验的积累和专业素养的提升,日本社会研究学科整体水平会越来越高。

关键词:日本社会研究 发展轨迹 比较研究 中日

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作为日本研究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涉及日本的人口变动、社会福利、社会思潮、社会政策、社会运动、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社会性别、大众传媒、城市化、婚姻、家庭、教育、劳动、社会问题等诸多内容。对日本社会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不仅有利于学科发展,还有助于加深我国民众对日本的了解,并为我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社会治理以及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是对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日本社会研究总体状况的回顾与展望,因资料所限,研究对象仅限于30余年来大陆公开出版或发表的学术专著、论文,不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

一、日本社会研究的发展轨迹

(一)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社会研究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两国处于长期隔

阂状态,相互之间缺乏了解。邦交正常化以后,双边关系发展迅猛。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引起中国的普遍关注,中国的日本研究呈现蓬勃发展态势。80年代中期,各地日本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成立。例如,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大学日本学中心、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日关系史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与此同时,日本研究领域的学术杂志不断涌现,日本研究者人数大幅增长,语言、文学、经济、历史、政治、外交、哲学、文化等各学科的日本研究全面展开,为日本社会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学术界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有两个亮点,一是不少研究者对日本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兴趣浓厚,有不少论文或学术资料从社会视角介入日本现代化研究;二是一些日本学者的社会学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如:中根千枝的《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福武直的《日本社会结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现代日本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还有一些介绍日本社会、日本社会学的译文。这些社会学著作和译文开拓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对中国读者了解和认识二战后的日本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的日本社会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社会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论文数量不多,内容偏重于对日本社会的介绍,理论性和学术性均较为欠缺。日本社会领域的研究专著较为罕见。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诞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研究日本婚姻家庭问题的专著,即张萍的《日本的婚姻与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4年版),该著作对战后日本婚姻与家庭状况以及日本妇女地位做了综合性的描述和评价,历史跨度较大,视角也较宏观。

(二)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社会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少子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日渐疏离,以终身雇佣制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经营体制发生动摇,教育领域出现诸多问题,国民普遍对未来丧失信心。针对日本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获得较快发展,表现在:领域不断扩大,论文和专著数量逐渐增多,研究者队伍进一步壮大,学科也更加细化,理论性和学术性逐步加强。

日本人口、家庭、就业、妇女、社会阶层等领域诞生了大量学术论文,另外,还产生了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唱新的《现代日本城市管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周维宏的《日本农村工业化史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梁忠义主编的《当代日本社会教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刘天纯的《日本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杜建人的《日本城市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建安的《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卓的《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刘银良的《现代日本社会》(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国庆的《日

本农村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专著涉及日本的城市、农村、教育、家庭制度、现代化、社会保障等领域,在中国的日本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三) 21世纪以来的日本社会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球化、信息化、消费社会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养老、护理、育儿、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等问题成为日本政坛、学术界、媒体和国民普遍关心的话题,其中一些现象令人深感忧虑,如:非正规雇佣者和失业者比例迅速加大,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以“飞特族”、“御宅族”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的社会参与大幅减少,年轻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家庭和零储蓄家庭数量增长,忧郁症、狂躁症患者人数增多,自杀率升高等,这些日本社会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均成为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所关注的课题。

进入21世纪后的日本社会研究,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步期和90年代的快速发展期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李卓对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研究做了如下评价:“视野之新、研究对象之新、研究方法之新,标志着中国学者在日本社会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进展。”^①

李国庆是较早关注日本社会和日本社会学的学者,他在《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运用大量日本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以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了战后日本民主化、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及特征,阐述了日本人的家庭、职场、社区等主要生活领域的传统特征,分析了日本的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探讨了世纪之交日本社会的结构变化。书中还专辟一章对日本社会学的发展时期、研究热点、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详尽地介绍。该书对中国日本社会研究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研究在以下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进展。

一是日本少子老龄化研究。进入21世纪,不少研究者将研究聚焦于少子老龄化问题,尤其侧重于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历史进程、现状、成因及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方面,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近

^① 李卓《近十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社会文化研究(1997-2008)》,《南开日本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年来,老龄化研究拓展到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政策,研究的主题也扩展至与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的劳动人口变化、家庭结构、养老模式、社会活力、社会与家庭再分配、消费结构、社会经济负担等领域。^①这方面的论文有:宋金文的《当代日本家庭论与老年人抚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王伟的《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对社会的影响》(《日本学刊》2003年第4期)以及田香兰的《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兼论日本的人口政策及效果》(《日本学刊》2011年第5期)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老龄化领域中,有关完善老年保障体系、健全社区老年服务、确立居家养老方式、充分发挥老年人潜能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还有论文涉及日本超老龄社会。蔡林海所著的《老化预防、老年康复与居家养老:日本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成功经验与启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阐释了老化预防与老年康复的社会意义,老化预防与老年康复及居家养老和居家护理的基础知识。该书还对日本的居家养老服务战略、日本社会的养老国家战略、日本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

二是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有多部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专著出版,如:吕学静编著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沈洁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宋金文的《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韩君玲的《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崔万有的《日本社会保障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莉莉和郭平主编的《日本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宋健敏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这些著作涉及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等,囊括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方方面面。较之90年代的日本社会保障研究,这一时期的成果呈现出更为

系统化和综合性的特点。还有一些论文探讨了日本社会的低保制度、社会保障预算编制等。^②

三是妇女、婚姻家庭、家族制度、女子教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是从婚姻家庭研究起步的。进入21世纪以来,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增多,学术性增强。同时,出现了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和日本的婚姻、家庭、继承制度等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社会性别这一新的研究视角。^③该领域的学术著作有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与《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慧荣的《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胡澎的《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赵敬的《当代日本女性劳动就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在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的研究领域中,田晓虹的《战后日本婚姻关系的整合与冲突》(《日本研究》2001年第3期)和《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关系嬗变》(《日本学刊》2004年第1期)等文章探讨了日本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向着平等、自主、更富人性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四是日本社会思潮和现代化研究。在社会思潮领域的研究中诞生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著,如:高增杰的《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纪廷许的《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京华的《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赵军的《日本右翼与日本社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刘金才的《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李文的《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分别从町人和武士道的视角对日本近代化动因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五是社会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文化史、中日关系史

① 王伟《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30年综述》,《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崔晓冬《日本社会保障预算编制及其启示》,《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具体研究状况请参考胡澎的《中国的日本妇女与家庭研究30年综述》,收入李薇主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等领域均较为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近现代日本社会史的研究一直未有进展。2010年,李卓的《日本近现代社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的出版使这一落后状况大为改观。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冠以日本社会史的学术论著,也是从社会发展这一全新视角解读日本近现代历史的一部有着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此外,在社会阶层、城市化、社会运动、社会组织等方面均有不少成果问世。

二、当今日本社会研究的特点

(一) 日本社会研究的队伍正在形成

改革开放后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他们广泛接触日本社会,接受了严谨的学术训练,了解学科前沿动态。现在活跃在日本社会研究领域的不少专家、学者,都有在日本学习、生活或访学的经历,有的还是从日本教育机构毕业的博士、硕士,不少人学成回国后成为日本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较程度的提高,学术研究的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一批批更为年轻的留学生学成回国,成为日本社会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还有不少国内培养的新一代研究者也涌现出来。当今从事日本社会研究的研究者,大多在政府的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工作,也有个别来自媒体等其他机构。这些研究者大多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对日本社会保持着敏感和关注。有些研究人员与日本社会学研究界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能站在学科前沿进行研究。目前,一支日本社会研究的队伍正在形成,且逐渐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知识结构多元化的趋势。

(二) 关注日本社会变化与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当今日本社会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相当多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日本社会变化和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例如,日本在平均寿命、老年人口数量、

高龄化速度这三方面均可称为世界第一老龄化社会,日趋严峻的少子老龄化是日本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国研究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研究者积极应对,在人口问题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另外,日本在战后的经济起飞和发展阶段建立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2000年4月1日又正式实施护理^①保险制度。中国学者对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不仅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方方面面的阐述,还将研究向综合性、系统性方向推进,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护理保险制度的学术著作。^②

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差距扩大问题成为日本社会各界人士议论的话题。中国学者敏感捕捉到这一变化,有关日本的社会阶层、收入分配、雇佣就业、公平公正等方面的研究相继问世。如胡欣欣在《社会差距问题及日本的相关研究》(《日本学刊》2007年第3期)中着重介绍了日本政府对差距扩大问题的态度以及学术界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和理论。相关论文还有施锦芳的《现代日本社会收入差距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邢雪艳的《变化中的日本雇佣体系》(《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王海涛和谭晓军的《日本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及趋势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8年第4期)等。田思路、贾秀芬的《日本非正式员工的“社会排斥”与权利回归》(《日本学刊》2012年第6期)一文阐述了在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派遣工、外包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不断增加,其弱势地位导致了他们难以融入社会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经济市场、社会组织、文化生活、政治活动所排斥的状况。另有多篇论文从社会治理、低收入群体、“飞特族”等角度对社会阶层、社会差距进行了论述。^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离婚现象呈现出数量逐年增多、年龄段偏高、女性占主导地位等一些新的特点,“定年离婚”甚至成为一个社会流行词

① 中国学术界对日语中“介护”一词的翻译尚未统一,有人译成“护理”、有人译成“看护”,也有人直接用“介护”来表示。

② 这一领域的论文有:宋全文《日本护理保险改革及动向分析》(《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闻武刚的《日本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成效分析与启示》(《日本研究》2010年第4期)、施锦芳的《日本看护保险制度的沿革及其思考》(《现代日本经济》2011年第2期)等。

③ 参见王彩波《优良的社会治理与相对的平等——日本经验的再思考》(《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6期);朴京玉《日本社会低收入群体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田莎莎《日本“飞特族”的光与影——格差社会中彷徨的日本年轻人》(《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6期)。

汇。中国学者几乎同时关注到这一现象,并对中老年离婚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张冬冬的《当今日本社会离婚现象透视》(《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离婚热与当代日本社会伦理》(《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日本的中老年离婚热及其原因探析》(《日本研究》2010年第4期),以及王桂兰的《透视中日两国“中老年人离婚”现象》(《日本研究》2010年第2期)均对离婚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这一时期,日本涌现了大量超越行政框架,进行自由和自律活动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分布在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社区营造、国际援助、灾害救助、人权维护、男女平等、环境保护、反战和平等领域,通过提供服务、开展各种活动,已经成长为促进经济发展、协调社会、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完善公民社会的一支新生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之后,中国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公民社会的建设急需汲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王名等编著的《日本非营利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暄的《日本社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的出版,无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民间组织的发展有一定借鉴作用。胡澎的《日本NGO的发展及其在外交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11年第4期)和《非营利组织在日本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南开日本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等论文对日本的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做了积极的评价。

近年来,日本青少年研究涉及青少年思想教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与大众文化等诸多内容。青少年心理问题是社会高度现代化带来的副产品。作为亚洲第一个高度现代化国家的日本,忧郁症、“蛰居”现象(或称“闷居”)等心理问题突出,特别是“蛰居”现象已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且表现出男性青少年比例增高,“蛰居”的时间越来越长,人数越来越多的趋势。中国学者对日本当今青少年问题较为关注,黄喜珊、刘鸣的《日本青少年的闷居现象:现状、危害、背景及应对》(《比较教育研

究》2011年第5期)、师艳荣的《日本青少年蛰居的现状与对策》(《当代青年研究》2012年8期)偏重对“蛰居”的含义及类型进行梳理,探讨“蛰居”在日本产生的背景,阐述日本应对“蛰居”的措施。尚会鹏的《日本社会的“个人化”——心理文化视角的考察》(《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虽不是直接研究青少年问题的,但他运用心理文化理论对这一日本社会现象的解读深刻而到位。他认为,支撑日本“集团社会”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正在向着“个体社会”转变。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个人化”是造成日本自杀率增高、抑郁症患者增多、青少年自闭者和“自我萎缩”者增加以及“熟年离婚”等日本特有现象增加的重要原因。

(三) 日本社会研究中比较视角的应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研究中比较视角的应用比较突出,这说明研究者有着较强的中国问题意识,希望通过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来解答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自然增长率高,人口素质较低,另外,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同时,人口结构也发生重大转变。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日本社会研究出现了不少关于中日老龄化现状、异同及老龄产业的比较研究。如查建华的《中日两国老龄产业发展比较研究》(《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着重分析日本老龄产业中的护理产业及护理保险制度所起的作用,以及对老龄生活商品的开发及老龄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并对中日两国老龄产业在市场主体、产业关联性及老年人收入来源等领域进行了比较。还有从东亚视角对日本老龄化的比较研究,如《东亚:人口少子高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日本·韩国比较研究》^①对三国少子老龄化的过程、特征、表现、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在社会保障、养老模式、文化培育、住宅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有助于促进相关部门思考和出台少子老龄化对策。王莉莉的《新时期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比较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从国际视角对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及特点进行了分析,为了解日本的人

^① 王桥主编,耿田井正、原田康平主审《东亚:人口少子高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日本·韩国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口老龄化状况提供了科学翔实的依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面对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中国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有着儒教传统的邻国日本,有关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近年来,中国的日本社会保障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介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侧重对中国的启示,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揭示中国与日本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共性与差异,并探索形成异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有不少论文都在探讨日本养老方式、养老保险体系、居家护理服务等对中国的启示。如,广井良典和沈洁主编的《中国·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与借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不但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还对中日社会保障进行了比较研究。关宁的《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研究及启示》(《日本研究》2010年第3期)、黄雄的《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特色及其启示》(《亚太经济》2011年第3期)等论文讨论了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侧重于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他们认为日本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为我国建立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范围从中日两国扩展到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等,聚焦于东亚社会保障模式可行性的探讨。^①如,万金炳彻、于洋、杨立雄合著的《中日韩生活保护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提出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当中最基本且必不可少的制度措施,也是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政府有责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社会救助的实施。赵立新的《德国日本社会保障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则将社会保障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亚洲拓展到了欧亚。

中日两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同是以家族制度为社会组织基础,实行父权家长制,妇女在法律、道德上地位较低。然而,两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又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学者在考察

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之后,开始从家族制度、妇女解放思想和实践等角度来思考日本的近代化道路,探求中日两国近代化成败的原因,从而揭示两国文化的差异。在中日两国家庭制度上的比较研究领域,代表性成果有李卓的《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和尚会鹏的论文《中日传统家庭制度的比较研究》(《日本学刊》1991年第4期)。落合惠美子、宫坂靖子、周维宏、山根真理编著的《亚洲社会的家庭和两性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是近年来对亚洲家庭的社会学研究中较为罕见的一项大型跨国实证比较研究成果,来自日、中、韩、泰、新的学者专家对亚洲五国六地的女性在家庭里承担的各种角色进行了深入地比较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四) 日本社会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

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与介绍是日本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日本不少社会学名著以及社会学畅销书被翻译过来。如,高坂健次的《当代日本社会分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鸟越皓之的《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住居广士主编的《日本介护保险》(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磯崎初仁、金井利之、伊藤正次的《日本地方自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网野善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桑原洋子的《日本社会福利法制概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等。这些著作无疑拓宽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对缩短中日两国日本社会研究的差距有着积极意义。特别是在社会阶层领域,桥本健二的《战后日本社会阶级构造的变迁》(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三浦展的《下流社会》(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佐藤俊树的《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野雅至的《日本的社会病:富人的傲慢和穷人的怠慢》(现代出版社2013年版)和《日本人的处世术:什么人在日本能得到回报》(现代出版社2010年版)等一批著作纷纷被翻译出版。这些著作对日本社会阶层进行了剖析,为中国研究者展现了

^① 参见万国威、刘梦云《“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统一性》(《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1期);林义《关于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的理论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的现实。落合惠美子的《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分析了走过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的日本社会所经历的家庭和社会性别的变化。结城康博、嘉山隆司的《日本老年人的生存困境——来自一线的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上野千鹤子的《一个人的老后》(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为中国研究者提供了近距离观察日本老龄化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2005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策划、周维宏担任主编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共10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别是藤井胜的《家和同族的历史社会学》、上野千鹤子的《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吉野耕作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广田康生《移民和城市》、江原由美子的《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作田启一的《价值社会学》、正村俊之的《秘密和耻辱——日本社会的交流结构》、富永健一的《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熊泽诚的《日本式企业经营的变革与发展》、橘木俊诏的《日本的贫富差距——从收入与资产进行分析》。这种有计划、有组织、成规模地翻译日本社会名著的做法,对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起了推进作用。

三、日本社会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取得了不小进步,表现在研究成果数量上有了大幅增长,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理论深度有所提高。日本社会研究专著和论文,内容涉及社会史、社会结构、婚姻、家庭、妇女问题、人口变动、社会阶层、企业组织、农村社会、城市化、社区、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问题、社会思潮、大众传媒等领域。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已成为日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观而言,中国日本社会研究的总体水平依然比较滞后。正如王伟在论述中国日本社会研究时所

阐述的,“日本社会研究仍属于弱小学科,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①即便是在日本研究领域,相比日本外交、日本经济、日本文化等学科的研究,日本社会研究也存在着差距。日本社会研究的学术成果散见于各类学术刊物,虽涉及面较广,但显得零散而不够系统,宏观分析的成果较多,微观分析的成果较少,许多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描述性和阐述性阶段,没有通过深厚扎实的理论来进行验证。

日本社会研究在理论上也较为滞后,不少论文停留在简单运用西方社会学、人口学及社会发展等理论对日本社会现象和问题加以分析和诠释,缺少足够的理论阐释,深度也有待提高。“研究方法亟待改进。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的基础上,还应运用调查法、比较法、归纳法、统计法、分析法等其他方法,熟练使用数理分析和数量分析方法,以及思想实验、实验室实验、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等各种方法。”^②

从事日本社会研究的专门人才还比较少,且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缺少一个整合日本社会研究的平台。在日本社会领域,中日两国共同的合作研究较少,两国研究界互动不够,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日本社会问题研究者之间也缺乏联系,相互了解不够。这些无疑对日本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创新的创新不利。另外,中国的问题意识还应进一步加强,在对我国进行建言献策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后,相信随着日本社会研究者经验积累和专业理论素养的逐渐提升,日本社会研究学科整体水平会越来越高,学术规范会进一步加强。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中日两国社会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密切,一个联系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日本社会研究网络将会建立起来。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晓博

① 李薇主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页。

② 林昶《“杂志”视点: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化及其与世界的链接——学术讨论会综述》,《日本学刊》2011年第2期。